

国际关系学书系

THE CON
OF NATION

ON
CE

国家形象构建

李正国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国际关系学书系

国家形象构建

李正国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形象构建 / 李正国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 10
(国际关系学书系)

ISBN 7-81085-594-8

I. 国… II. 李… III. 国家—形象—研究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0724 号

国家形象构建

著 者 李正国

责任编辑 冬 妮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86-10-65450532 65450528 传真: 65779405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85-594-8/K · 40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1

第一节 全球化·国家认同·形象 /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方式·综述 / 12

第一章 国家形象概说 / 22

第一节 界定说:定义·视角·确认 / 22

第二节 构成说:我形象·他形象·错位形象 / 30

第三节 关系说:综合国力·软权力·位势竞争 / 37

第四节 表现说:外交形象·公众形象·媒介形象 / 45

第二章 国家形象的原点

——追逐国家利益的起始与归宿 / 55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合理拓展:影响力·吸引

力·威慑力 / 56

第二节 国家战略的形象定位:文化安全·形象
博弈 / 64

第三节 国家形象的符号置换:实利诉求·文化
输出·标本意义 / 72

第四节 敌意国家形象的幻化:决策者意象·
镜像敌人 / 80

第三章 国家形象构建的心理语境及掣肘考量

——双重意蕴的民族主义与非传统

安全的挑战 / 87

第一节 国家形象的生态需求:民族主义·精神
内核 / 89

第二节 国家形象的内在呼唤:爱国主义·
凝聚力 / 97

第三节 国家形象的扭曲呻吟:狭隘民族主义·
非理性 / 106

第四节 非传统安全的颠覆性:新理念·新挑战 / 114

第四章 国家形象的构建手段

——多重手段构筑的系统工程 / 122

第一节 国家形象构建的内容:政治影响力·
普世价值 / 123

第二节 国家形象构建的基础:军事力量·强者
气势 / 132

第三节 国家形象构建的提升:经济援助·人道
主义 / 141

第四节 国家形象构建的核心:公共外交·赢取民心 / 150

第五节 国家形象构建的关键:政治传播·传媒实力 / 159

第六节 国家形象构建的魅力:文化逆差·和而不同 / 168

第七节 国家形象构建的捷径:借势成事·改善形象 / 176

第五章 国家形象的修复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信力重铸 / 185

第一节 国家形象修复概述:公信力重铸·被动转化 / 186

第二节 国家形象修复的宗旨和原则:以人为本·信息透明·快速反应 / 194

第三节 国家形象修复的一般规律:危机公关·媒体角色 / 202

第四节 国家形象修复的方式:施援救治·受援维护 / 211

第六章 大国崛起的国家形象定位

——权力转移与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 / 219

第一节 崛起大国的突围:动因·方式·形象 / 220

第二节 中国国家形象:探源·解读 / 228

第三节 中国崛起的形象定位:国力·参与·负责 / 237

第四节 中国形象的误读:表现·构架·内敛 / 245

第五节 和平崛起的形象协调:改变·调适·包装 / 254

主要参考书目 / 262

后记 / 265



绪 论

有人说,只有在信息时代,国家形象的作用和意义才真正被发掘和重视。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有一定道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国家形象前所未有地引人注目并受到主权国家的重视。但由于历史和时代原因所致,到目前为止,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几乎是在理论缺席的状况中进行,研究势必显得滞后。有鉴于理论不能与实践同步,才凸显出本课题研究的现实迫切性与重大理论意义。

第一节 全球化·国家认同·形象

国际社会对国家形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深化过程,那就是近代以来,主权国家依靠暴力手段来攫取权力,而忽视了一部分精英所注重的文化思想的入侵和占领。在历经诸多战火的劫难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权力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伴随着对全球化理解的逐步深入,国家形象不但成为一个国家获取国际认同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突破口之一。

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告了国家主权体系的诞生,标志着国家完整和独立的主权成为国家的象征。领土、主权、人口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也

勾勒出近代国家的宏观轮廓。主权作为统治者对内行使的最高权力,对外独立于所有权威的一种理想化的法律地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可以命令国家应该如何行为的权威;没有一个行为者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告诉国家应该做什么”。^①换言之,国家主权的确认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法律意义上体现出一种平等,也使得国际体系呈现出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安全和发展而不遗余力地追逐国家利益,整个世界陷入一种“利己”的混乱状态。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深信,处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会为了权力而互相碰撞,因为谁有权力谁说了算,要想达到有关安全生存的目标和将国家利益最大化,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追求权力。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的经典之说就是国际政治即权力政治,国家利益就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而权力又充满了强迫性,因为“权力是指用威胁或剥夺的方式使他人做某事的能力”。^②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早就明确指出,君主不能按照普通人的道德观来管理国家,否则就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此后,有现实主义者将其做了延伸: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为了权力的最大化,道义的价值被扯去了温情的面纱,统治者在寻求国家利益时不可避免地采取文明社会所难以接受的政策,放纵自身的野蛮行为,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

修昔底德(公元前400年)在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雅典人权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畏惧,这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根据摩根索的观点,在权力斗争中,每个国家的策略和目标不外乎三种:维持权力;增加权力;显示权力。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除了传统的军事手段,也可以是经济手段和文化手段。前者旨在维护有利于己的现有权力格局不作变化,次者表明新兴崛起的国家试

① [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著,王玉珍等译:《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② Arnold Wolfers, *Disord and Dollaboration*, Johns Hopkins, 1962, p. 103.

图改变现存的权力体系,后者希冀借助国家的形象威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然而,纵观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的欧洲战争中,宗教利益、王朝利益和道德原则不再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利益和理性原则逐渐指导着国家的主要行动。诸列强通过战争来解决矛盾,用和约妥协来结束战争,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近代专制国家体系逐步形成。在战争与和平的较量中,在利益的追逐过程中,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强权实力说拥有了历史进程的“话语权”,以至于国家以何种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早已退居其次了,战争成为权力角逐的重要手段。如果脱离权力说,人们很难解释爆发在1756年欧洲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帝国战争——美西战争……甚至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因。然而当每一个国家都在寻求自身安全,以免受外来攻击或统治时,势必会想方设法取得越来越多的力量,这种行为反过来又会令与己利害相关的国家感到不安,刺激对方扩充实力,循环往复,由此陷入了所谓的“安全困境”。因此,在维持、增加、显示权力的过程中,前两者的分量要远远大于最后者。傅新认为,就前现代文明而言,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智力资源开发、思想文化传播与交流大受局限,因此,国家形象理论只能体现为少数社会精英的思想成果。关于国家形象的认识基本产生不了超越国家政治边界的影响力,甚至对本国政治的影响都微不足道,更遑论主权至上理念与国家形象理念形成矛盾,维护主权无疑会制约国家形象发挥影响力的法理空间。^①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文明的提升,国际社会开始反思采用暴力手段追逐权力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转而追求一种合乎人性表达的“显示权力”的方式:国家形象。

早在冷战期间,国家形象的研究就开始应用于外交决策过程。

^① 傅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兼对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思考》, <http://www.cis.org.cn/item/2004-07-22/50503.html>。

在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军事对抗体系,即两极格局。尽管对于两极对抗形成的“恐怖平衡”有着不同的争议,但和平毕竟成为大势所趋,并且客观地延续着。在此格局下,美苏两方不约而同地扛起意识形态的大旗,互相指责对方的“霸权行径”,把自己扮演成“和平卫士”,在各自集团内充当领袖,前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广泛的影响力,而后者则控制着东欧等国,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对前苏联态度的案例研究表明,杜勒斯把敌人形象僵化和简单化的做法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消极影响。显然,国家形象已经沦落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的幌子和工具。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乃至国家的决策思维仍然是现实主义占据上风,比如对两极结构、暴力冲突、威慑等理论的探讨,都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动和走向。

最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跨国集团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各种全球性问题,如环境、能源、经济危机的出现,要求人们从全球范围来考察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观察视角和界限开始被超越。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以经济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动力的全球化过程对世界历史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变迁过程,借助于经济和科技力量的推动,各个区域、民族、国家通过商品货物、资本、信息、人员的流动,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相互依赖的联系。这种相互依赖有两层意义,国际行为主体对来自外界的触动是敏感的,其一,一方变化会迅速连带其他行为主体的跟进反应;其二,行为者容易受到来自这些变化结果的伤害。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不但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而且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主权的让渡颠覆了人们头脑中原有的国家概念,强烈地冲击着国际关系的整体框架,也对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

全球化对主权国家造成了重大影响:全球性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增大,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开始深度超越各主权国家的

传统边界,一些重要决议和相关的国际公约具有普遍的约束性;国家权力出现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出现动摇;国家认同遇到了危机,全球化进程对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使许多国民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全球化表现了同质性,自主性表现了异质性,全球化没有消除国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凸显了自主性,等等。^①

面对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强烈冲击,国内外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甚至提出了一些较为偏激的观点,比如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弱化论等。一方面,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被认为正朝着全球化的宏观方向运行;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正经受着去中心化的巨大挑战。所谓“去中心化”,就是国家内部各个民族或团体对国家产生的疏离和由此产生的地方分离和突起现象,“中心”即国家,去中心化的主体是宗教、种族、区域等次国家组织。国家逐渐转变成日益增多的多样化政治实体中的一个,它的政治支配形式受到削弱,国家不再是认同的最终落脚点,不再具有最高的合法性。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不等于国家主权的消失,因为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都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经济的跨国界发展、国际组织和跨国机构的建立,其前提条件就起源于发起国的国家利益。一个没有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只能依附和从属于他国,命运握在别人手中,任人宰割和欺辱,至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安康、国家的形象和尊严等根本得不到保障。为国家自身的发展而采取各项措施,正是行使国家主权的表现。此外,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消除民族间的不平等,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也必须依靠各主权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就坚持认为国家在实际体系中仍然最具影响力,因而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来源。

当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对比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并进行分化、组

① 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合与较量,各国尤其是各大国都力争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威望,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自身的国力,以维护或谋求增进本国的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因此,当下世界各国对国家形象的日益重视是主权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必然。这是一种思维转变,更是一种战略定位,尤其是对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的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与其说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倒不如说加强了国家的生存调适能力。国家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与其外部环境发生互动的生态系统,环境的历史性嬗变刺激着国家的应变反应,同时孕育着国家新的发展契机。毫无疑问,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发展的核心力量。作为拥有独立主权的行为角色,国家是管理特定领土、人口,并在国际社会中代表和保护其人民的中央政府。从社会学角度看,它是一个在特定区域内的最大人类群体,而生存于群体中间的个体为了生存和心理的需要,必须效忠于群体,并为维持其特性、安全和生存而行动,因为群体认同能给个体一种基本的归属感和自尊感。作为一个最大群体单位的国家,能否有效地行使主权,根本上取决于国民在政治上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

所谓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国民对本民族和本国家的语言、文化、传统、边界、制度、价值、利益和身份的一种自觉的认可和接受”。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能是族群血缘或语言文化,也可能是社会与政治制度,当这种独特性被大多数国民所认同并进而构成国家认同的基础,也就成为了国家身份,其对外部世界的表现形态就是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就是国家认同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生存发展的一种号召力、一面旗帜。比如,前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过程中,联邦各共和国的人民逐步建立起对原苏联的国家认同。由于这一认同过分依赖于原苏联自身实力的保持和增强,以及由于相对封闭造成的对外界信息了解的缺乏,因此,在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下,经济停滞带来巨大的冲击,国家认同由此被毁灭,种种力量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苏联国家的瓦解。从某个角度说,如果将世界主义者和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算作例外的话,无疑每个人都无法摆脱国家认同的力量

引力,因为国家认同不仅是个人生命中最重要集体认同,具有强烈的凝聚作用力,同时也是国家主权合法性的来源。

显而易见,全球化既是一个国家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因素。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民族分裂势力的膨胀,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的原有价值与力量存在很大关系,车臣分裂武装、爱尔兰共和军都属此类。民众政治意识的淡漠、国家合法性的削弱,势必造成国家认同的下降,损害国家形象的影响力,从而危及国家安全,严重影响国家权力的作用范围、强度、形式以及权力的制度基础和观念形态。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国际安全环境的相对缓和以及国际政治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出现的文化现象一样,文化研究也渗透到国际安全和国际战略领域。于是,西方学者提出,全球化是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是不同文明的全球整合,是知识体系的全球传播。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人们有理由担心,全球化不但会危及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也对各具特色的民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构成强烈冲击。当代美国依靠发达的大众媒介、资讯交流以及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通过广播、电影、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化,尤其是电视侵入其他国家,在文化交流的形式下实施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以强大的冲击力诱惑意志薄弱者放弃民族文化传统,达到维持、巩固和扩大其在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目的。试问,当迪斯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风靡世界的时候,有哪个国家不对自己的文化受到美国的“入侵”表示担忧呢?

但与此相反,国家不但仍然享有主权的法律地位,而且还具有其他国际行为体所不具有的军事、经济、地理方面的能力。它毕竟还是国民个体的“保护伞”,在真正的世界公民尚未出现的当下,国家认同在消解国家主权的同时,却从国家形象构建的角度强化主权意识,成为抗击文化霸权、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个武器。经典现实主义者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关心国家形象的好坏,是因为有利的国家形象具有内在的实用价值。奥运会上激烈角逐后国旗的冉冉升

起、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得主国家的狂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自豪……无疑都在彰显著民族国家的自豪感。此外,民族主义的泛化甚至极端宗教势力的蔓延,同样说明了国家形象对分化、消解这些负面作用力的重大意义,并日益为国民、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所重视,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一方面,提升国家形象是对全球化时代的集体认同提出的要求。认同理论主张,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以后,才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数量,并且国家利益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的,与国际体系形成互动的关系。^① 关注国家形象的构建不但是新形势下对权力政治反思的结果,而且是国际行为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形象才能够被确认,国家的品格才能被承认,国家的个性才能得以展示,否则国家就会处于一种“孤芳自赏”的状态,由此会使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变成主观的一相情愿,也就失去了形象应有的价值。因此国家形象是一种国家主观见诸国际社会的客观的构建,而不是一种仅仅发源于国家主观的塑造。多年来,主要国际政治学流派均以权力概念来建构理论体系,在和平与发展依然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当相互依存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潮流时,基于生产力进步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方式的深刻变革,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认同的需要和高度体现,既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精英评价体系的樊篱,也突破了外部评价主体长期面临的技术壁垒。

除了国家认同之外,集体认同还具有不同的层次,既有双边的,也有地区的或多边的,更有全球性的。国际集体认同具有双重规范的手段,其一是制约或改变国际行为体原有的偏好,使其不受承认,甚至广受谴责;其二则使国家、个人和其他行为体理解,什么是能被承认的和有价值的,什么是获得肯定的有效而合法的途径,使行为体学习新的偏好和修正原有的偏好。一个对此能够进行明确诠释的例

①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子是,“非典”疫情爆发初期,由于决策的失误,西方主流媒体公开对中国政府和政治体制进行指责,世界舆论哗然,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和国际形象受到很大损害。当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后,迅速纠正失误,及时、公开、透明地向国际社会报告疫情的最新情况,通过坚定的手段遏制“非典”的蔓延,并开动各种舆论机器呼吁国民树立信心,向世界展现了共渡难关的民族精神和对世界负责的大国形象,最后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另一方面,信息革命赋予国家形象以文化战略的高度。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是传统国家安全,比如军事、经济、政治安全,而忽略了文化安全。冷战结束后,影响安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文化霸权、文化扩张、文化渗透等问题日益突出,全球化带来的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巨大鸿沟,使一些国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能够对外大力输出本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进而对国际力量格局施加重大影响。“文化生存是国家和民族生存的前提,文化的生存状态不仅积淀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全部文化创作和文化成果,而且还蕴含着过去向未来的发展基因,一旦文化遭遇威胁,则必然要给民族和国家带来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从而也构成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①

在国际关系领域,文化力能够使一个国家影响其他国家,并按照它自己的目标行动,使一国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政策、影响国际事务、实现预想目标,达到传统力量所难以企及的目的。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时期,文明或者文化的冲突将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破坏力量。西方国家的飞速发展将把西方文明带上一个顶峰,但也刺激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意识和寻根思潮,各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明显开始增强。主权国家为了在全球化中不被湮没,必须要保持一种个性品质,必须强化国家认同。而国家形象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反映,作为国民精神凝聚力的一种助推,作为国际关系学家约瑟夫·奈称之为软权力之一的文化吸引力,能够把诸如

^① 马振超:《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储备等客观存在的国家潜力“激活”起来并加以协调,使之产生出现实的权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它顺理成章被提升到文化战略的高度上,被赋予一种国家力量。文化产品不同于普通物质产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但可以获得经济利益,而且还可以在其消费过程中,为本国赢得宝贵的文化认同。这些存在于人心中的种种因素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国家文化形象,这种富有新意的国家文化形象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甚至有人认为,国家形象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进入国际舞台的通行证。

第三个方面,国家形象构成了软权力的新语言。纵观国际关系史,近年来国家间对权力以及诉诸权力追求的目标的本质有了很大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变迁使得国家权力的源泉和重心发生了转变,大多数国家更愿意以说服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权力重心由原先单纯的军事、安全等层面逐渐向经济、教育、科技等范畴偏移。在依赖传统权力的同时,国家开始注重软权力的价值取向。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今天权力的使用已经由硬权力为主转向软权力为主。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形象或者成功都可以使这个国家成为其他国家愿意跟随的榜样。与传统权力的强制特色所不同的是,软权力属于一种合作型权力,它强调通过相互依存而产生合作性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政治事务的最终仲裁者就是权力,国家要想提升软权力,追求良好的声誉、构建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就成为必然选择。王沪宁曾从文化与软权力关系的角度,将“社会的国际形象”纳入构成国家实力基础的六个方面之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国土面积只有几百平方公里,军事实力不强,但在亚太地区甚至对一些西方大国都很有影响力。除了自身经济的发达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借助东盟组织提高发言权,构建了一个有能力的区域代表形象。在时代主题内涵不断延伸的态势下,关注国家形象既是适应形势变化、创造良好对外交往环境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更是增强国家实力、满足内在生存与